



(2024 年 3 月，第三期)

编委会

主 编：屠磊

副主编：丁峰、王竞、刘蓉蓉

责任编辑：刘蓉蓉、张政

目录

一、 新法速递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2024 修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
二、 观点速递	6
杜万华：改善我国营商环境和彻底解决执行难的法治保证	
——摘自微信《中国法律评论》	6
三、 实务研究	11
公司解散纠纷案件要素式审判指引（试行） 适法统一	
——摘自微信《上海二中院》	11
彭汤欣、李卓卓：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理论基础与规范构造	
——摘自微信《法律适用》	25
侯丹华&陈越峰：市场主体登记的合法性审查 微课程	
——摘自微信《上海一中法院》	44

_Toc163044257

一、新法速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 (2024 修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发文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发布时间：2024.03.11

生效时间：2024.03.11

效力状态：现行有效

(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于同日公布施行 2024 年 3 月 11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了健全国务院的组织和工作制度，保障和规范国务院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三条 国务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依法行政，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国务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第四条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国务院应当自觉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第五条 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组成。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

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按照分工负责分管领域工作；受总理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专项任务；根据统一安排，代表国务院进行外事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行使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职权。

第七条 国务院实行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度。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国务院全体成员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八条 国务院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决定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部署国务院的重要工作。

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法律草案、审议行政法规草案，讨论、决定、通报国务院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应当及时公布。

国务院根据需要召开总理办公会议和国务院专题会议。

第九条 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任免人员，由总理签署。

第十条 国务院秘书长在总理领导下，负责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国务院设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秘书长工作。

国务院设立办公厅，由秘书长领导。

第十一条 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经总理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确定或者调整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第十二条 国务院组成部门设部长（主任、行长、审计长）一人，副部

长（副主任、副行长、副审计长）二至四人；委员会可以设委员五至十人。

国务院组成部门实行部长（主任、行长、审计长）负责制。部长（主任、行长、审计长）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委务、行务、署务）会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签署上报国务院的重要请示、报告和发布的命令、指示。副部长（副主任、副行长、副审计长）协助部长（主任、行长、审计长）工作。

国务院副秘书长、各部副部长、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副审计长由国务院任免。

第十三条 国务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优化协同高效精简的原则，按照规定程序设立若干直属机构主管各项专门业务，设立若干办事机构协助总理办理专门事项。每个机构设负责人二至五人，由国务院任免。

第十四条 国务院组成部门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当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由国务院决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主管部门可以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发布命令、指示。

国务院组成部门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法律规定的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第十五条 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

第十六条 国务院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行政决策制度体系，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加强行政决策执行和评估，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

第十七条 国务院健全行政监督制度，加强行政复议、备案审查、行政执法监督、政府督查等工作，坚持政务公开，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强化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第十八条 国务院组成人员应当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认真履行职责，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民务实，严守纪律，勤勉廉洁。

第十九条 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调、密切配合，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工作部署贯彻落实。

第二十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观点速递

杜万华：改善我国营商环境和彻底解决执行难的法治保证

——摘自微信《中国法律评论》

一、破产之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将“破产”界定为市场主体在经营中间出现了“资不抵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或者是明显缺乏偿债能力”的情形。社会化交易普遍以借贷关系、买卖关系、劳务关系为表现形式，在这三种基本经济关系中，如果出现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的现象，包括用尽自己的所有财产也不能偿还，那就出现了破产现象。

很显然，破产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出现交易以后就已经存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由于商品经济还处于从属地位，出现破产这

一经济现象的机率相对较低，且不具有普遍性。但在生产交易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时代，出现破产的机率大幅度提高，这一点是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决定的，与市场主体的道德意识水平和法律意识水平高低没有必然联系。

以企业为例，破产现象的发生通常是因为生产要素在企业中出现了错误配置，以致制造了已经落后乃至不被市场接受的淘汰商品，其凝聚在商品中的各种生产要素无法通过交易被置换出来，从而导致现金流短缺，负债越积越多，最终陷入破产状态。

我们应当认识到，破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并不必然是市场主体无能或者不道德的行为，故应当以平常心看待。

破产这一经济现象的出现，其发生事由主要有四大类：第一，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因为自身决策、判断错误、经营不善、以及自身竞争力量薄弱导致破产；第二，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引起破产；第三，国家间相互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对抗催发企业破产；第四，自然灾害等等诱发破产。

因此，出现破产情形如同人患病一样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即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予以忽视。对于“患病”的企业，我们要运用法律手段去保护它、帮扶它，使其重新焕发生命力，而不能任由自生自灭。

二、破产法律制度的性质和特征

破产法律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偿债法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奴隶、封建社会时期，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不足以偿还债务时，往往需要以出让自己的人身自由、身体权、健康权抵偿债务，或者出让自己的子女、妻子抵偿债务。

在资本主义初期，英国《安娜法案》的颁布，阐明了破产法全面清算原则、债权平等受偿原则和债务豁免原则，构建了全新的个人破产制度。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从个人破产发展到法人组织破产，从单一的破产清算制度，发展到重整制度与和解制度“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形成了完整的市场主体出清制度和救治制度，对缓和西方国家的社会

矛盾，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尤其以我国为视角，破产法律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破产制度的目的是要解决与市场主体的救治与退出相关的问题，保障市场主体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特征上看，我国破产法律制度不仅仅在于处理破产相关事务，更重要的是对“人”的保护。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相关破产事务的处理，来实现对“人”的保护。此处的“人”指的是破产法律关系中所涉及的当事人，破产法律制度不应受制于传统上奉行的“债权人中心主义”，而应当在当事人之间树立起“衡平”的法律理念。

具体而言，包含如下六个方面：第一，保护债权人的债权利益实现最大化；第二，保护债权人债权的平等受偿；第三，保护重整投资人合法权益；第四，保护善良守法债务人的债务豁免权；第五，保护危困债务人接受救治的权益；第六，保护好债务人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正是坚持以“人”为中心,从“保护”的角度出发,建议我国全国人大正在修改的“破产法”,法律的名称应当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保护法”,更准确的体现我国破产法的“保护”特征,抵销“破产”一词在文化上的污名化色彩,消除破产案件当事人对“破产”一词的“心魔”。

三、我国破产保护法律体系的构成

目前,我国的破产法还是单一的《企业破产法》。从破产保护法律体系上来讲,它是极不完善的。我国的市场主体已达 1.6 亿个,真正的法人组织也就只有 5000 多万,剩下的 1.1 亿个非法人组织和个人市场主体没有纳入到破产保护体系之中。如果这部分市场主体出现破产现象,那它们就得不到破产法律的保护。

因此,这次全国人大在修改“破产法”时,应当正式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将个人破产制度写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保护法”(以下简称“破产保护法”)里面去,那我国数量庞大的个人创业群体就可以得到破产法律的保护了。这样,我国的

破产保护法律制度就构成了“个人”、“法人组织”和“非法人组织”共同组成的破产保护网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营商环境的保护将大大改善。

我国破产保护法律体系不仅在主体上应当扩大范围,在破产保护的形式上也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在十多年前就规定了破产保护的形式,即重整、和解和破产清算。当前对破产法进行修改时,应当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重整、和解和破产清算过程中对破产保护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对个人破产保护方面,作出基本规定,以便此项工作的推进。另一方面,应当在坚持三种破产保护法律形式的基础上,总结和吸收大量成功的重整经验,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一些破产制度,如预重整制度等等。

四、破产保护法律体系构建的愿景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化建设需要“破产保护法”,补齐社会主体救治和退出制度的短板。根据“木桶理论”,一个木桶盛水的

多少不取决于它的长板，而取决于它的短板。“破产保护法”的制度不建立，它的短板始终存在，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就不完整，装水量就始终提不高。

其次，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产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化，需要“破产保护法”催生新业态，改造传统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重整和破产清算对市场要素进行重新配置，逐渐帮助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催生的企业，实现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无缝衔接。

再次，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需要“破产保护法”。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首先主要针对的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当他们出现破产事由时，若符合重整标准，不单单进行债务重整，而应当按照程序进行企业重整，找出陷入破产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救治生病企业，防止治标不治本。

最后，我国稳住小微企业的基本盘，推动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需要“破产保护法”。对于占有极大比例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特别是“专精特新”小微企业，他们陷入破产困境后若得不到破产保护法

律的相应保护，那民营经济的投资积极性会受到压抑，就业的恢复会受到影响，消费的增长信心得不到支持，整个市场的活力将难以激活。

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没有国有企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会不稳；而没有民营经济，特别是大量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会不活。当前，我国经济的现状不是不稳，而是不活。因此，利用破产保护法律制度稳住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激发其活力，应当是当务之急。

五、完善破产审判工作制度对于解决“执行难”的意义

我国当前的民商事司法审判工作运行机制，是当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立案和审判的分离”、“审判和审判监督的分离”、“审判与执行的分离”的改革建立起来的。通过这一改革，人民法院建立起“立案、审判、执行”三个环节组成的司法工作运行机制。

这个工作机制通过职能分工，提高了工作效率，形成监督机制，推动审判和执行工作适应了全国案件

大幅度增长的需要。但因工作机制缺少破产环节，当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难”问题成为了困扰人民法院、困扰整个社会的一大难题。二十多年来，人民法院虽采用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和探索，但至今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此，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破产保护法律制度，尤其是通过建立个人破产保护法律制度来彻底解决“执行难”。

首先，应当明确执行和破产制度的各自分工。执行应当针对的是有钱不还的当事人，他们能履行法律义务而不主动履行义务，无视法律规定，是当然的“失信人”；而破产保护法律制度针对的是无钱履行法律义务的当事人，他们可能虽然愿意履行法律义务，但因没有履行能力，不应当归入“失信人”，而是“失能人”。

其次，如果在实践中难以区分“失信人”和“失能人”，可以通过现行司法手段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如果经过认真查找没有发现被执行人财产，可以建立被执行人宣誓制度，要求被执行人宣誓自己现在无财产可供执行。宣誓后，执行程序终

结。以后如果发现财产，除查封该财产外，被执行人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最后，如果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只能满足部分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终止执行，告之债务人和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案件转入破产保护程序审查。通过破产保护程序，能够重整与和解的，通过重整与和解程序救治危困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已无救治可能的，通过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如果采用执行与破产相互协调的制度，饱受社会各界诟病的终结本次执行制度和参与分配制度可以废除。这样，执行可以大大简单化，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效率也可以大大提高。但是，这一切都应当以个人破产保护制度的建立为前提条件。

通过完善破产审判工作制度，补齐当前民商事司法工作运行机制的短板，进而构成科学化的中国民商事司法工作的运行机制，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2035年，我国应当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基本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美好愿景。今年是2024年，离这一目标还有11年，时间已经比较

紧迫了。但如果现在开始狠抓，这个目标应当能够实现。

三、实务研究

公司解散纠纷案件要素式审判指引（试行）| 适法统一

——摘自微信《上海二中院》

为提高上海二中院及辖区法院商事审判思维能力，提升商事审判质效，完善适法统一机制，上海二中院商事审判庭对在部分商事案件中适用要素式审判方式进行了类型化调研和探索。本期刊发《公司解散纠纷案件要素式审判指引（试行）》，系上海二中院商事审判庭与杨浦法院商事庭共同撰写，并经上海二中院商事庭专业法官会议讨论通过，供辖区法院商事审判庭参考。

常见审理要件及审查路径

公司解散纠纷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主要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和第一百八十二条（2024

年7月1日起施行的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百三十一条，内容基本一致）。当公司出现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股东会决议解散、合并或者分立、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解散事由时，公司应当解散。本指引主要围绕股东无法达成解散合意时，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通过司法权介入，强制公司解散的情形而展开。公司解散纠纷案件的审理要件主要集中在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能否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四个方面。法院在处理公司解散纠纷案件时，应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审理要件为路径和线索，收集案件要素，梳理争议焦点，并据之展开审理。

一、诉讼主体是否适格

1. 行权主体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

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原告应当是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此明确了法院须依职权审查的两大要点,其一原告是否具备股东身份,其二原告所持表决权是否已达一定比例。此类诉讼中,针对行权主体的资格往往存在以下四种争议:

(1)瑕疵出资问题。一般情况下,股东存在瑕疵出资问题并不影响其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行权资格,除非公司已就该股东履行法定除名或限制表决程序。股东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系各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独立于公司解散法律关系,存在瑕疵出资问题的股东应依约、依法对其他股东或公司承担违约或侵权责任。而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系股东针对经营管理僵局寻求司法救济的最后解决方式,若任由僵局状态持续不止,极可能导致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受损,该项诉权不应受到出资瑕疵的影响。

(2)股权名实不一问题。一般情况下,隐名股东不具备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行权资格,例外情形包括该隐名股东已通过公示途径或司

法途径进行显名,或该隐名股东已实质具备显名条件,例如公司以及其他股东认可其股东身份、其已实际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决策经营管理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但此“投资权益”并不等同于“股东权利”,公司解散之诉的最终结果不仅涉及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还会影响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关联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若准许未经身份公示程序、不具备显名条件的隐名股东可随时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将扰乱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秩序,从而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债权人等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3)表决权比例的时点问题。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仅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须“同股同权”,故有限责任公司的表决权并不必然与登记的股权比例一致,尤其在当前注册资本认缴制的情形下,公司可通过章程的约定,设计与认缴比例不同的表决权架构。因此,法院在审查行权主体资格时,注意应审查的要素系股东表决权的比例是否已达百分之

十以上，而并非仅着眼于持股比例。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要求原告所持表决权的比例在公司解散之诉的全过程中均保持百分之十以上。因此，若原告仍具备股东身份，但所持表决权的比例在立案后有所下降或被稀释，则法院不应再就诉讼过程中发生的比例变化进行实体审查，考量行权主体资格的时点应为起诉时。

（4）过错股东可否行权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对公司无法继续经营、股东之间丧失信任基础的局面形成存在过错的股东，仍有权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能否以司法介入的方式强制解散公司，需实质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能否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等审理要件是否同时满足，通常与人合性丧失的形成原因、公司僵局的责任认定均无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并未明确限制过错股东主张司法强制解散，公司或受侵害的股东有权向过错股东另行提起损害赔偿等侵权之诉，一般不直接在公司解散之诉

中解决公司与股东之间或各股东之间的权益纠纷。

2.适格被告、第三人

关于公司解散纠纷案件中被告及第三人的身份问题，法院在审理时须注意查明以下要点：

（1）适格被告的确定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四条规定，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原告以其他股东为被告一并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告知原告将其他股东变更为第三人，原告坚持不予变更的，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对其他股东的起诉。

公司解散纠纷从法理而言属于变更之诉，该类案件的被告应为公司，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原告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而言，若法院最终认定公司符合解散条件，则公司将依法进入清算程序。若法院最终认定公司不符合解散条件，则公司将继续存续。原告与公司之间出资与被出资的法律关系仍然依旧，公司始终是此类案件法律效果的直接对象。另一方面，就原告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而言，随着公司的成立，各股东之间所订立的关于

设立公司的协议已履行完毕，转化为各股东与公司之间出资与被出资的法律关系，各股东之间已不存在解除设立协议等问题，故其他股东不应作为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

（2）适格第三人的确定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他股东，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股东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申请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公司解散纠纷中除了起诉股东与公司以外，还涉及另一重要主体即公司的其他股东。由于法院关于公司解散之诉所作出的判决将对全体股东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基于法院有关调解工作和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其他股东确有参与诉讼的必要性。因此，法院在处理公司解散之诉时须通知其他股东一同参加诉讼，且应视该股东的主张而区别处理其身份究竟是共同原告还是第三人。若其他股东以与原告具有相同主张而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列为共同原告；若其他股东以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利害关系为由申请参加

诉讼的，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二、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的要件之一系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又进一步列举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种常见类型以及兜底情形。常见类型包括：第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第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而兜底情形则是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发生了与上述三种常见类型程度相当的其他严重困难。法院应围绕公司整体的运转状态，以审慎、公平、合理为原则，以审查以下三方面要素为基础，对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予以综合判断。

1.管理性困难

（1）内部机构是否运转失灵

公司的内部机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对公司具备管理职能的组织。法院审查的侧重点在于这些内部机构的运转是否存在严重障碍，从而形成了公司内部管理上的僵局状态，导致治理机构的决策、执行、监督等功能瘫痪。例如：股东（大）会应当召开而不能召开，但若仅为客观上长期没有召开，则不能当然认定为“无法召开”；董事会僵局形成后本应尝试召开股东（大）会或监事会予以纠正，但股东（大）会或监事会却拒不履行或无法履行各自职责。

（2）陷入管理僵局的时长

一般而言，公司陷入管理僵局的时长要求为两年以上，且须为持续状态，若该期间公司内部机构曾恢复运转，则不能再据此认定公司在该期间已持续性地陷入了管理僵局。例如：经个别股东的斡旋、调和，公司在原告提起解散之诉前得以成功召开一次股东（大）会，形成有效决议；虽然各董事之间冲突严重，亦无法召开股东（大）会予以解决，但各董事在原告提起解散之诉前，曾通过书面函件等形式对某些对外交易进行了一致确认。

2.经营性困难

（1）财务盈亏的影响

公司存在经营性困难通常会表现为盈利艰难、长期亏损。一般而言，盈亏情况可以作为判断公司是否陷入经营困难的参考因素。但须注意的是，财务亏损不是认定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充分事由，能够盈利也不必然意味着公司的经营状态顺畅无阻。法院应审慎处理盈亏状态与经营困难之间的逻辑关系，需区分公司亏损究竟是因内部机构长期运转失灵所致，还是因短期决策失误或突发环境因素所致。同时，法院还应综合考量公司处于亏损状态的时长、是否具备扭亏为盈的能力、是否已造成股东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等情况。例如：在财务审计报告显示公司并无亏损的情况下，该公司内部机构因股东之间的个人矛盾长期无法运转，且该公司的主营业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市场规模已大幅萎缩，则亦可能被认定为具备经营性困难。

（2）对外业务的开展情况

公司存在经营性困难一般还会表现为对外业务开展不畅。公司是

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兼顾社会责任的制度设计，对外业务常态化的能力足以影响一家公司是否具有继续存续的必要性。法院在查明此项参考因素时应严格把握、全面考量对外业务开展不畅的持续时长、形成原因以及恢复可能性。例如：股东之间矛盾尖锐，导致公司人合性全面丧失，对外业务已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开展，且并无线索显示此公司存在恢复对外业务能力的可能性，则宜认定此公司已陷入经营性僵局；股东之间虽矛盾尖锐，但对外业务停滞时间尚短，且管理人员正尝试恢复对外交易，则不宜轻易认定此公司已陷入经营性僵局，还应结合公司的盈亏情况等其他因素，综合考量此公司是否具备恢复对外业务常态化的能力。

3.确认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阻却事由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若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由此可见，一方面，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等，均系公司处于不良经营状态的或然表现形式，却并非确认公司发生经营管理困难的充分事由。另一方面，公司强制解散分为行政解散与司法解散两种形式。股东在法院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系属司法解散，而此处的“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则属于行政解散的法定事由。若确已发生此种情况，则股东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无须再重复提起公司解散之诉。

三、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无“利益受损”“重大损失”的统一量化标准。一般而言，公司解散纠纷案件中所述的“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并非是指全体股东的利益遭受具体、直接、有形的损害，而是指提起解散之诉的股东的利益遭受整体、间接、可能的损害。法院应以个案情况为出发点，以公平合理的价值判断为原则，以全面审查以下三方面的要素为基础，对公司继续存续是

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问题予以综合判断。

1. 损失类型

“股东利益”通常分为管理控制权益和投资收益权益两个方面。在公司解散之诉中法院应侧重于审查后者，即股东的投资收益权益是否受到损失。一般而言，法院主要从公司的当前盈亏状态以及注册资本是否充实这两个方面加以审查。例如：公司现处于亏损状态，需以长期发展的角度判断通过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是否能够显著提升公司经营能力、扭亏为盈，以弥补股东投资收益方面的损失；公司现处于盈利状态，因股东之间的冲突使得内部机构运转停滞，需判断若公司持续经营、各股东的预期投资收益目标是否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

2. 损失程度

关于“何为重大损失”并无统一量化标准，故法院通常须结合原、被告之诉辩意见以及案件事实，以公司当下的实际经营管理状态为依据，对股东利益受损是否重大作出综合评价。例如：公司已被行政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法院须审查公司是

否具备消除经营异常原因的可能性以及恢复正常经营的能力，以此为基础来判断若公司继续存续，股东投资收益的损失是否重大；若公司虽处于盈利状态，但经营管理陷入僵局，法院须审查公司现状究竟对股东造成了何种损失以及损失的具体程度。

3. 股东利益受损与公司存续之间的因果关系

除了上述对损失类型、损失程度的判断以外，法院还须进一步审查股东利益受损与公司继续存续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若起诉股东所主张的利益受损并非因公司的存续状态而导致，或者能够通过公司继续存续而得以改善，则不能构成公司解散之条件。例如：大股东因丧失管理控制权益而主张利益受损、要求解散公司，则应在全面审查损失类型、损失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考量该股东所主张的利益损失是否为因公司继续存续而产生的常规经营成本以及合理的投资风险。若是，则不宜认定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是否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公司解散之诉系弱势股东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僵局的最后途径，此类案件中法院应本着“尊重公司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原则进行处理。股东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经营管理僵局时，才被赋予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所谓“其他途径”一般包括内部途径与外部途径两个方面：

1.关于内部途径

例如通过申请召开股东会讨论人事任免、行使股东知情权、行使质询建议权、进行内部或对外股权转让、请求公司收购股权等方式，解决公司经营管理的僵局问题。

2.关于外部途径

例如通过请求行业协会、行政部门、其他利益相关方等第三方进行矛盾调解，向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盈余分配之诉等方式，解决公司经营管理的僵局问题。

另外，法院在判断股东“能否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这一审理要件时，须注意：起诉股东是否已采取其他途

径解决公司僵局并非法定的、强制性前置程序。即便起诉股东尚未采取其他途径解决矛盾，而径行提起公司解散之诉，法院仍应予以受理，并展开实体审查，以保障股东提起解散之诉的程序性权利。某些情况下，起诉股东欲举证其曾尝试采取其他途径解决的现实可操作性较弱或存在客观障碍，若将穷尽其他途径作为强制性的前置条件，将违背公司解散之诉的立法本意。法院在诉讼中应注重调解工作，这既是着眼于实质性化解纠纷的应然之举，也是进一步查明和验证纠纷是否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有效方法。

五、其他审理注意事项

1.管辖

（1）仲裁机构裁决权的排除。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赋予仲裁机构解散公司的裁决权，即使公司章程或各股东之间的协议约定了有关解散纠纷的仲裁条款，应属无效。

（2）公司解散之诉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解散公司诉讼案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

管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县、县级市或者区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的解散诉讼案件。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地区、地级市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的解散诉讼案件。

2.保全

在一定条件下，起诉股东享有在公司解散之诉中申请保全公司资产的程序性权利。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或者证据保全的，在股东提供担保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予以保全。

3.调解

因解散公司系终结公司的独立人格，对股东、员工及债权人等各方主体均具有重大影响，故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本着弱化矛盾的原则，注重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矛盾。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

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4.法定解散与意定解散的区别

若因公司经营管理出现僵局，股东根据法律规定起诉至法院要求解散公司的，属于法定解散。若在公司设立之初或在经营过程中，各股东曾签订有关解散公司条件的协议或章程，则当解散条件成就后，股东根据合同或章程起诉至法院要求解散公司的，属于意定解散。法院在审理公司解散之诉时，应注意区分原告的主张依据。若原告主张法定解散，法院应综合考量上述四大审理要件是否已具备；若原告主张意定解散，法院应审慎把握协议或章程中约定的解散条件是否成就，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5.解散之诉与清算程序的关系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同时又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对其提出的清算申请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在人民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后，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和该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自行组织清算或者另行

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因此，若股东直接向法院申请公司强制清算获准的，则股东已无需再提起解散之诉。若公司尚不符合强制清算的申请要件，则股东应优先提起解散之诉，在法院作出公司是否解散的认定前，不得同时提起清算申请。

审理要素的确定和收集

一、审理要素的确定

依据上述关于公司解散纠纷案件的四个审理要件、五个方面其他问题的归纳，可将此类案件的审查路径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归纳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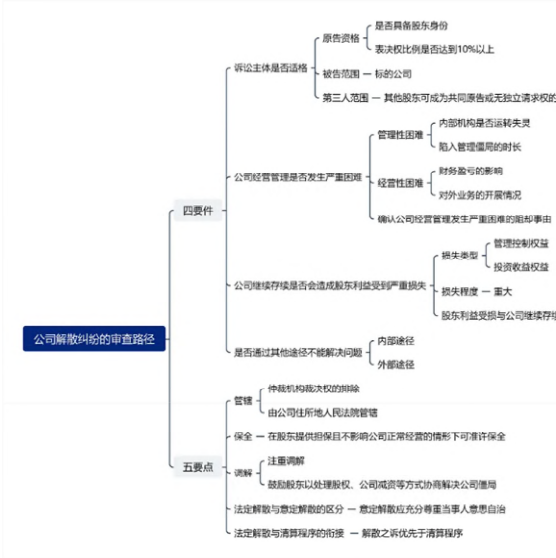


图 1 公司解散纠纷的审查路径

法院在审理公司解散纠纷时可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依据上述脉络展开要素式审理，可涉及的相关要素见于下表：

表 1 公司解散案件的审理要素

诉讼主体是否适格	股东资格、表决权比例、被告范围、第三人范围
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	内部机构运转情况、陷入管理僵局的时长、财务盈亏情况、对外业务的开展情况、相关其他诉讼情况
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损失类型、损失程度、股东利益受损与公司继续存续之间的因果关系
是否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尝试情况及效果、本案调解情况
其他问题	章程或股东协议是否存在关于解散条件的约定

二、审理要素的收集

要素的收集是正式开展审理的基本前提，表格式的收集方法较为高效便捷，表格的具体形式可以在总结上述四要件、五要点的基础上，结合要件审判九步法的相关步确定。故法院可在对案件开展实体审理之前，向当事人送达要素表进行填写，还可以以要素表为主要实体内容，要求原告提交要素式诉状，被告提交要素式答辩状。参见下表：

表 2 供原告填写的要素表

案件审理要素		证据清单
原告身份信息	XXX，出生年月日，……	<input type="checkbox"/> 身份证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材料
诉讼请求	解散 XXX 公司	<input type="checkbox"/>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登记档案 <input type="checkbox"/> 公司章程 <input type="checkbox"/> 股东名册
原告行权资格	XXX（反映原告股东身份以及所持表决权比例的相关信息）	

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	XXX（反映公司内部机构运转状态的相关信息）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材料
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XXX（反映股东收到何种损失以及损失程度等相关信息）	
是否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XXX（反映股东已采取的解决途径的相关信息）	
调解意愿	XXX（反映是否同意调解的意思表示以及可行的调解方案内容）	<input type="checkbox"/> 调解方案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材料

表 3 供被告填写的要素表

案件审理要素		证据清单
被告身份信息	XXX, 住所地 XX X, ……	<input type="checkbox"/> 营业执照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材料
总体答辩意见	XXX (反映其是否同意 XXX 公司解散的意思表示)	<input type="checkbox"/>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登记档案 <input type="checkbox"/> 公司章程 <input type="checkbox"/> 股东名册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材料
原告行权资格	XXX (反映原告股东身份以及所持表决权比例的相关信息)	
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	XXX (反映公司是否存在管理性困难或经营困难的有关信息)	
公司继续存续是否	XXX (原告股东是	

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否受到损失、损失程度以及因果关系等相关信息)	
是否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XXX (反映争议各方已采取的解决途径的相关信息)	
调解意愿	XXX (反映是否同意调解的意思表示以及可行的调解方案内容)	<input type="checkbox"/> 调解方案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材料

表 4 供第三人填写的要素表

案件审理要素		证据清单
第三人身份信息	XXX, 出生年月日, ……	<input type="checkbox"/> 身份证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材料
总体述称意见	XXX (反映其是否同意 XXX	<input type="checkbox"/> 市场监督管理部

	公司解散的意思表示)	门备案登记档案 <input type="checkbox"/> 公司章程 <input type="checkbox"/> 股东名册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材料
原告行权资格	XXX (反映原告股东身份以及所持表决权比例的相关信息)	
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	XXX (反映公司是否存在管理性困难或经营性困难的相关信息)	
公司继续存续是否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XXX (原告股东是否受到损失、损失程度以及因果关系等相关信息)	
是否通过其他	XXX (反映股东已采取的解决	

途径不能解决	途径的相关信息)	
参加调解的意愿	XXX (反映是否同意参与调解的意思表示以及可行的调解方案内容)	<input type="checkbox"/> 调解方案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材料

上述要素表一则可作为对当事人的诉讼指引，二则兼具裁判指引和庭审提纲的效能，三则可以固定案件事实，帮助法官庭前迅速确定争议焦点并对争议事实展开实质审理，提升庭审效率。

要素式庭审与文书

一、要素式庭审

由于庭审前当事人已经通过填写要素表的形式充分表达了己方观点，阐述了要素事实。法庭在庭前对比诉讼双方提交的要素表，可以迅速确定无争议事实和庭审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参见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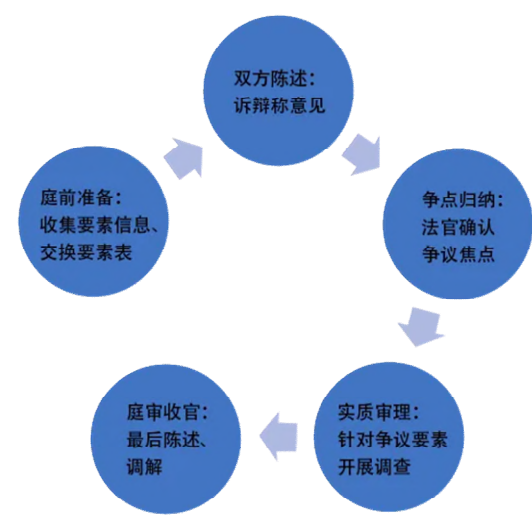
表 5 供法官庭前归纳争议焦点的表格

	原告	被告	第三人
身份信息	XXX	XXX	XXX
诉辩理由	原告 诉请	答辩 理由	述称 意见
无争议要素事实	一、XXX；二、……		
有争议要素事实	一、XXX；二、……		
证据	XXX	XXX	XXX

由此，要素式庭审可以更加高效地进行：在双方简要陈述各自的诉辩意见之后，法官即可结合案件要素事实确认本案的无争议要素，比如，原告的行权资格等，同时可以归纳出争议要素暨本案的争议焦点。庭审可以采取将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合并的方式，由双方围绕争议要素举证、质证和辩论。当事人

最后陈述后，若调解不成，则可以及时对案件作出裁判。

图 2 要素式庭审流程



二、公司解散纠纷类案件的要素式判决书

公司解散纠纷案件中，四个审理要件项下双方的争议事实往往较多。通过上述要素表的填写以及要素式庭审，法院一方面可以快速固定无争议事实，形成判决书中无争议的事实查明部分，另一方面可以准确定位案件的争议焦点，并就争议部分着重进行说理。因此，通过采用要素式审理的方式，能够较大提升判决书写作的便捷性及高效性，法院可以根据《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和《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中对“能够概括出固定

要素的案件”的说明，不再分割陈述事实查明和法院认为部分，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对争议要素逐项进行认定，从而得出裁判结论。

彭汤欣、李卓卓：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理论基础与规范构造

——摘自微信《法律适用》

摘要：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制度重心为，董事违反其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时应承担责任。法人实在说不构成第三人责任的反对理由。一方面，鉴于董事与公司关系的变化、董事行为的可归责性以及第三人责任的现实意义，新《公司法》第 191 条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并删除修订草案一审稿中有关“连带责任”的规定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第 191 条规范功能为对董事责任的有限补充，而非无限扩张。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为侵权责任，第三人的范围包括债权人及投资者，但债务不履行原则上不产生第三人责任；此种责任的

构成要件包括行为、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原告需举证证明董事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新《公司法》第 191 条以董事行为的特征为规制前提，为我国民商法体系设置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一般规范，未来应结合民法典以及商事特别法完善法律上的董事责任体系。

关键词：

新《公司法》第 191 条 董事义务 董事责任 第三人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治理和商事交易中的重要主体，董事责任是公司法律关系的核心问题，如何确定其责任事关营商环境以及民商事法律体系的改善。但对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直接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下简称“第三人责任”），立法以及理论过去常持否定意见。传统公司法理论否定董事第三人责任，认为董事与第三人之间并不直接发生法律关系；民法中的实在说亦认为，董事行为被视为法人行为，因此董事

不承担第三人责任，但法人在承担责任后可向董事进行追偿。

2023 年修订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第 191 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条首次直接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赔偿责任，明确修正了实务和理论界过去在该问题上的态度。如何理解该条理论的正当性与规范功能，事关本条的正确理解适用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在私法体系中新《公司法》第 191 条属法人机关成员的外部个人责任一般规定，其不仅关涉民法体系中的法人本质理论，更需要在未来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特别规定产生互动，包括在证券虚假陈述中董事对投资者的损害赔偿赔偿责任，在抽逃出资以及违反催缴义务时的董事责任，以及公司未及时申报破产时的董事责任等。例如，能否通过目的解释限缩《证券法》第 85 条的适用范围，将董事承担证券法中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限缩在其具备侵权的共同故意公司时，在不宜

适用该条时转而适用新《公司法》第 191 条，从而将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中的董事责任以立法形式明确限定于董事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为避免第三人责任可能引发的寒蝉效应，以至造成董事在履行职责时过于谨慎甚至回避正常履职，并建构法人机关成员的外部个人责任体系，有必要对董事第三人责任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旨在分析公司法下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正当性基础、功能边界以及法律构造，为公司法的法律适用和理论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二、我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正当性基础

从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比较法例以及学说发展来看，是否要追究董事第三人责任并非在于法人本质或者法人机关的性质，而在于董事与公司的关系、董事行为的可归责性以及第三人责任的功能属性。

（一）法人实在说不构成第三人责任的反对理由

主张董事不承担第三人责任的理论依据为法人实在说。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机关的行为就是法人

的行为，董事或法人机关成员不对外承担责任。然而本文认为，法人实在说难以支持法人机关成员不承担第三人责任的结论。

从法人责任角度而言，法人实在说反对董事责任的推论缺乏规范依据。法人实在说是一种将机关与法人的人格等同的“神秘化”处理方式，其直接将法人机关的过错以及知情等同于法人的过错以及知情。我国民法典规定了三类法人承担责任的情形，包括非工作人员的归责规范、法定代表人以外工作人员的归责规范以及第 61 条、第 62 条规定的法定代表人归责规范，但均未在规范中事先确定何为法人的过错、知情以及相应的知情归责规范，因此无法推定法人机关的过错以及行为等同法人的过错。法律虽然规定了法人具有行为能力、权利能力、甚至责任能力，然而此类规定必须基于有明确规定何种行为及效果能够归属于法人的归属规则（**Rules of Attribution**）。行为归属不等于行为主体的同一，因为法人机关行为归属并非要求实现机关到法人的“神秘化转变”（**Mystifizierende Transsubstantiation**），最多只能说明

机关行为的后果与法人有一定关系。所以当民法典并未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时，应先考虑在特定情形下法人是否具有过错以及知情这一前置问题，再讨论法人机关的行为能否归责于法人。如果作为公司机关成员的董事为了其自身利益而侵害第三人利益时，不能一概以其侵权行为具有公司利益的目的而免除其责任，单纯仅让公司为其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可能赋予公司过重负担，并因在事后否定具有过错的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而在事前降低董事谨慎履职的意愿。另外私法史中立法者规定法人责任也并非表示其认同法人实在说下机关的“神秘化”。《德国民法典》第 31 条的法人责任仅基于公平考虑（**Billigkeitserwägung**）以及交往安全（**Verkehrssicherheit**），因为机关掌握的团体手段（**Vereinsmittel**）使之有能力伤害第三人，同时允许第三人起诉法人更能够保护其利益，但如果不要董事等机关成员直接承担责任从而在事实上限制第三人的救济则可能与法律目的背道而驰。

从董事是否承担责任的角度而言，法人实在说的意义在于使法人

承担责任，而不是免除董事对于第三人的责任以及否定第三人对董事的赔偿请求。法人实在说中所谓法人机关不承担责任的结论仅来自机关行为因“视为”而“合一”这一论断的概念推断，而非基于规范的论证。将法人实在说与法人机关成员不承担外部责任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实质上扩大了法人实在说的解释范围。首先，我国民法典没有规定机关行为与法人行为合一时就当然免除法人机关责任。其次，需要考虑的是，一个行为在法律上能否被多次评价。对此法人机关行为在法律上可以从是否归责于法人的角度被评价，也可以从要求机关成员承担责任这一角度被再次评价。法人机关成员的行为不仅可被视为法人行为，也可被视为法人机关成员的行为，其性质具有双面性。可见借助法人实在说而形成的以“部分之行为为整体之行为，部分之过错为整体之过错”的逻辑进路进而否定机关成员个人责任的论证方式，实质上是忽视了私法体系对行为的多元评价机制。

法律上团体人格的发扬不意味着个人人格的暗淡，董事作为法人机关成员，其不仅作为法人之部分

进行活动，同时也作为独立的个体与社会发生关系，因为团体法授予的是个人选择团体的自由，而非无视其作为个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在判断是否承担责任时，应当考虑的是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立场，超越法人实在说与拟制说的理论争端，以明确当代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正当性基础。

（二）董事与公司关系的变化

在 19 世纪末以及 20 世纪初，董事的权力来自股东以及股东大会的授权，股东大会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董事与公司在公司内部构成委任关系，在外部构成代理关系，该观念也被称为授权理论（Mandate Theory）。授权理论下董事的行为必须出于委托人利益的考虑，并服从委托人的指令。如在 19 世纪末英国董事会必须接受股东大会控制，因股东大会为公司最高机关（Supreme Organ）。在授权理论下董事的行为完全由股东大会决定，应由公司承担责任。

然而，现今世界主要的公司法基本已放弃授权理论，董事会权力要么直接为公司法所明确规定，如《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第 141(a)条；

要么由章程决定，如英国公司法模式，可以说授权理论消亡象征着董事会规则从合同法走向组织法。不可否认，在私法理论上董事职权与公司存在密切联系，且授权理论在当前阶段解释董事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以及董事无因解任等问题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尤其在我国公众公司治理现实中，中小股东难以形成对公司治理的实质性影响，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有待观察，股东会对于董事会的控制力亦有所减弱，因此是否仍有必要在原有授权理论下固守董事行为的内部性、从属性与董事的绝对免责，值得更多思考。

（三）董事行为的可归责性

过错责任原则下行为的可归责性（*Verantwortlichkeit, Culpability*）使该行为人需承担责任。在董事侵害第三人时，同时存在公司行为以及董事行为，董事行为具有可归责性，并且其行为也不同于公司行为。就算是实在说的坚定主张者基耶克也承认，行为人的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组织与个人的交织。因此下面主要分析董事行为的可归责性，主要包含董事的注意义务、违法

性，并区分董事行为与公司行为造成的不同损害。

首先，董事的注意义务不因公司内部关系而免除，当董事违反注意义务时仍与第三人发生侵权法律关系。其一，行为人具有合理注意义务（*Duty of Reasonable Care*），而注意义务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对外承担侵权责任的关键，依过错责任原则，任何人不得违反不侵害他人权利的注意义务，或消极履行对他人的法定或约定的保护义务。类似地，美国公司法中参与理论下董事责任的实质是董事参与行为的可归责性。区分一个侵权行为是董事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的确存在一定困难，但是判断一个董事是否在公司侵权行为中有参与行为却较为清晰，因此应当依据其对侵权行为的参与程度来判断董事是否负有损害赔偿赔偿责任。董事地位以及董事与公司的委任关系具有相对性，董事对第三方的注意义务不因委任关系或其董事地位而免除，董事也不能声称其为法人机关成员抑或代理人而免除其侵权责任。这一点与合同关系有所不同，在公司对外订约的合同关系中董事作为个人对第三人不具有一

般注意义务，基于董事与公司的内部关系该行为归于公司，由公司承担责任。其二，平等是私法的基本原则，民法典以及公司法的私法体系虽然赋予了董事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职权，但没有免除董事作为一般人对他人的注意义务。其三，从董事自身角度来说，董事以其行为承担过错责任要求董事对其行为应有相应了解。在董事知晓或应当知晓其行为可能导致第三人损害时，董事面临是继续在职务范围内开展行动并最终损害第三人，还是通过避免参与或促使公司规避不法行为以履行对第三人的一般注意义务的取舍，体现了董事在其能力范围内的自主选择，如董事放弃或怠于履行对第三人应有的注意义务则应予归责，因此要求其承担第三人责任也是对其意思自治的尊重。

其次，董事违反注意义务行为的违法性不因团体或公司法律构造而消灭。是否免除机关成员的个人责任，必须符合法律秩序的要求。实在说也认为一个组织行为能力范围内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秩序对该行为的要求才能够被评价为组织行为。假使不存在公司法和团体法，仅

依据侵权法的一般规则，董事参与侵权行为也应承担责任。那么如果认为公司法以及团体法采取了完全免除董事责任或者实现了某种将公司的侵权行为单纯视为组织行为的立场，可能诱使自然人成立公司进行欺诈，意味着公司法和团体法存在此种对于侵权法进行实质性修改的立法目的。然而公司法和团体法均反对滥用法人格进行欺诈，准则主义下公司设立的目的也不包含容许董事利用公司进行欺诈或故意侵权。

最后，董事的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造成的损害是不同的。确定董事应否赔偿及赔偿数额应依据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造成了第三人损害进行判断。在现代公司治理的背景下，董事对于法人侵权的责任不宜进行简单二分，即认为其行为独立地造成了特定损害，或者认为其行为与损害毫无关系。例如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需要董事会进行审议，而在董事会一人一票的决议规则下，某一特定董事并不会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仍有可能影响公司决议以及相应事项的作出。因此应当单独评价各个董事在公司侵权中的特定行

为，而非简单地针对董事群体采取连带或完全否定二分的思路。鉴于此，新《公司法》要求董事承担第三人的非连带责任的规范模式可取，因为在该模式下各董事的行为能够被单独评价，而非刚性规定一律承担连带责任，而应依据董事行为的具体内容进行认定。进一步而言，确定机关成员责任应超越法人本质理论的争论，以促进公司和法人机关成员个人责任制度的展开与发展。

（四）董事第三人责任的现实意义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具有促进管理层谨慎履职，并强化债权人保护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公司法》第 191 条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一般规范，其不仅对现有董事责任的法律规范适用具有指引作用，也对未来董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制定或修订具有参考价值。我国法上规定了相当数量的董事责任条款，例如《证券法》第 85 条，新《公司法》第 51 条第 2 款、第 53 条第 2 款、第 163 条第 3 款、第 211 条、第 226 条等。以证券虚假陈述的董事责任为例，如果将《证券法》第 85 条的连带责任依规范目

的限缩在公司与董事在证券虚假陈述中的共同故意的情形中，则其他情形的证券虚假陈述多数人侵权则不适用《证券法》第 85 条。且因限于《民法典》第 518 条连带债务效力的认识，2022 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未能规定比例连带责任，因此通过目的解释限缩《证券法》第 85 条连带责任可能为当前的可行方案。倘若上市公司董事因不具有和公司的共同侵权故意，或者并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不宜直接适用《证券法》第 85 条项下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则可能转而适用新《公司法》第 191 条，从而实现在证券法下对董事责任的目的人性限缩解释，并借以灵活确定在各种情形下董事与公司对第三人不同的责任形态。

第二，董事第三人责任作为法人机关成员个人责任的特别规范，有助于填补民法典未规定法人机关成员责任的漏洞。董事第三人责任为法人机关成员对第三人的责任，而民法典在法人机关成员责任这一问题上未作明确规定。具体而言，

《民法典》第 62 条有关法定代表人的责任规范并未规定董事、监事等其他类型法人机关成员的责任承担方式和依据，没有明确责任依据究竟是自己责任还是替代责任，也未明确机关成员能否免责。如果以董事第三人责任立法确立了营利法人的法人机关成员第三人责任，那么在其他类型法人的法人机关成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第三人损害时是否需要直接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问题上，也可研究类推适用新《公司法》第 191 条的解释路径。

第三，在资本规制放松趋势下，董事第三人责任有助于强化债权人保护并补充法人格否定制度。有观点认为，对于董事的追责以及债权人的保护可以依靠法人格否定原则，甚至有学者认为董事第三人责任本质为法人格否定。此观点有待商榷。首先，董事第三人责任并不等同于法人格否定或揭开公司面纱，公司法人格带来的公司成员与财产的分离原则（**Separate Entity Principle**）并不适用于董事。如依据参与理论认定董事侵权行为无需主张揭开公司面纱。其次，依据新《公司法》第 23 条第 1 款法人格否定制度只能追究

股东的法律责任，而不能追究董事的责任。在我国资本规制逐渐放松的趋势下，需要依靠董事第三人责任提供制度性支持，例如在公司管理层作出偿债能力声明的情形下为债权人提供保护。取消或削弱法定资本制度意味着要求董事承担责任的诉讼可能增加，我国如需放松资本维持原则，则应当设置董事第三人责任。

第四，董事第三人责任有助于在事前减少债权人的风险溢价，通过法律减少市场的交易成本。公司债权人缺乏足够的信息或动力来准确评价风险，同时公司具有其他手段以降低被追责的风险，这导致债权人可能在其与公司的交往中追求额外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通过确立董事第三人责任，有助于促使管理层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以及妥善履行其注意义务以避免可能的侵权损害赔偿，降低债权人风险溢价从而减少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

第五，董事第三人责任有助于强化私法体系的债权人事后保护功能。美国法学者班布里奇认为，公司濒临破产时（**In or Near Insolvency**）要求董事承担责任是具有意义的，

因为破产时段是典型的企业最后时期，此时仅依靠市场机制将无法保护债权人。我国新《公司法》第 232 条第 3 款规定了及时清算义务，此外《企业破产法》第 125 条第 1 款规定了致使企业破产的董事的民事责任，但公司法以及企业破产法并未规定濒临破产情形中的董事负有及时申请公司破产的相关义务，这导致濒临破产公司继续负债，也即此时债权人较难全面实现债权。而在公司濒临破产时，如不存在第三人责任则董事可能出于有限责任保护的考虑大量负债而不是申请破产。设立第三人责任规范有助于督促破产濒临公司董事及时申请破产，以避免逃废债从而保护债权人利益，同时由于其适用范围不限于公司破产或濒临破产，因此免去了债权人证明公司濒临破产的举证责任。

三、董事第三人责任的功能边界

相比较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第 190 条，新《公司法》第 191 条删除了连带责任，该做法一方面消除了之前关于连带责任的争议，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如何理解新《公司法》

第 191 条规范功能的问题。有观点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理解为董事信义义务对债权人的扩张；也有学者认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是对法人实在说的修正和更新；还有学者反对纯粹的信义义务扩张说，认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为信义义务与侵权责任的混合发展。依据比较法经验、董事义务与公司义务的区分、公司法目的以及法律政策，新《公司法》第 191 条建构了董事依据其违反第三人注意义务承担责任的一般规范，终结了依据传统法人理论反对董事责任的绝对化立场，但其规范功能不是无限扩张董事责任，也不仅限于强化债权人保护，而是有限补充我国公司法下的董事责任。

（一）比较法考察

在英国法和美国法中，参与不法行为的董事对第三人负有损害赔偿赔偿责任为公司法与责任法的基本规则。美国公司法在 20 世纪早期判例仅将董事第三人责任限定为董事越权时的侵权行为，但在 20 世纪中期判例发展出了基于董事对公司侵权行为的参与行为认定董事责任的参与理论（Participation Theory），即如果董事参与了公司的侵权行为，

则对第三人负有损害赔偿 responsibility。当公司董事对于公司的故意侵权行为存在“参与”行为时，董事应当承担损害赔偿 responsibility，因为任何人不能以自己为了公司的利益行事而免除责任。可见，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为一项董事参与不法行为的当然结论，其主要依据为董事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而非特别义务。除此之外，主张董事为债权人的受托人，从而要求正常经营公司的董事对债权人负有特别信义义务的“信托基金理论”

（Trust Fund Doctrine）因无面额股的实行，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不具有现实意义，仅在破产法领域还有类似观点。

在英国法中，当董事不适用识别理论时应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识别理论（Identification Theory）是一项将董事行为归为公司行为的归属规则，在该理论下董事为公司的第二自我（Alter Ego），因此董事行为即为公司行为。早期该理论的意义仅在于使公司承担责任，之后则用于董事的责任抗辩，如果董事的行为能被归为公司，则董事不承担责任。不适用识别理论时董事需承担责任，如当董事在与第三人的行为

中具有责任承担（As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又如存在指使、授权、指挥、引诱等行为。除此之外，董事从事欺诈、错误陈述、侵占、损害公司或其他不诚信行为时，董事需以其自身的侵权行为承担第三人责任而不适用识别理论。董事并不是因其董事地位，而是由于其自身侵权行为而承担责任，因为任何人不能主张其侵权行为是为了其他人利益而免除其责任。

在受到传统法人理论影响的国家中，法律若意图让董事承担责任，则成文公司法需要明确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其规范功能为有限补充董事责任。例如 2005 年《日本公司法》第 429 条规定了董事等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第三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来自 1899 年《日本商法典》第 177 条、1938 年《日本商法典》第 266 条、1950 年《日本商法典》第 266 条之三。《日本公司法》第 429 条的目的为发挥替代法人格否定制度的功能，使债权人在公司无力清偿债务时得以通过追究故意、重大过失的董事的责任来实现债权。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公司

法》第 429 条并未明定董事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法第 430 条则规定了董事等对于第三人的连带责任，但此处的连带责任人为董事与其他董事，而非指董事等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董事注意义务与公司义务的区分

董事对于第三人具有不侵害其利益的注意义务，第三人责任强调的是董事与第三人存在因违反董事注意义务而形成的侵权法律关系，而不是要求董事对公司违反注意义务承担责任。如美国的参与理论中的参与行为包括授权、指挥、同意和批准，当公司不存在侵权行为时董事当然不成立侵权行为，因此违约损害赔偿不适用参与理论，且不作为或知情并不构成“参与”行为，如公司借款时董事没有过错，则董事不依据参与理论对公司负债承担个人责任。因此，董事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并不等同于公司对于第三人在合同关系中诚实、全面履行合同的义务，该法律关系也不意味着董事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合同法律关系，因此连带责任不合理地突破了公司与第三人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性。

不同董事在公司经营和公司治理中的实际职责存在差异，因此不同董事的注意义务也有所不同。例如股东背景的董事与独立董事的义务与职责有所不同，又例如在我国新《公司法》背景下，对于采取单层制的公司，任职于不同委员会的董事的义务与职责也有所区别。仅因董事地位不足以追究董事责任。兼任公司高管的董事、非执行但具有公司大股东背景的董事、独立董事之间基于职权分配也存在差异，因此不同董事对外部第三人的注意义务也有所不同，如特定董事仅对内履行职责而不对外执行职务，则其不对第三人负有特别注意义务，要求其承担过重的责任不具有合理性。

（三）公司法规范目的的限制

无限扩张的董事责任意味着董事可能难以负担相应赔偿义务。与公司具有法定资本的特点不同的是，董事作为自然人履行职责并不需要缴纳类似法定资本的“保证金”，一般情况下作为自然人的董事清偿债务的能力相较于作为法人的公司而言较弱，要求董事承担连带责任有可能成为董事履职不可承受之重。

连带责任规范实质是要求董事为公司债务提供担保，与法定资本制度存在一定功能重叠。但我国新《公司法》并未完全抛弃法定资本制度，那么既然有成立时对于股东认缴资本以及后续实缴资本的规定，要求董事对公司债务提供担保似无必要，也不符合公司法的基本原则。

除此之外，商事组织法也强调商事主体类型之间的界限。商事主体的类型界限，是法律为商事主体提供有限责任的法律依据，属于强制性规范，是私法中公司法秩序与组织法秩序的基本要素。合伙企业合伙人不能约定有限责任，公司也不能通过多数决要求全体股东承担无限责任。无限扩张董事责任，意味着第三人在事实上可以要求董事先于公司清偿债务，而这意味着董事的清偿顺位与合伙企业中的普通合人类似。此种责任模式模糊了公司与合伙的界限，不仅违反商业实践，损害公司制度，也违反了私法中的组织法秩序，进而可能对我国商业组织类型基本格局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四）法律政策的有效实现机制

从法律政策而言，有限扩张董事责任足以实现强化董事责任的法政策。强化董事责任的法政策考量为“追首恶”，要求双控人承担连带责任，以打击尤其是上市公司经营中的造假与欺诈。多数人侵权中的责任形态包括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以及补充责任。反之，强调董事连带责任则可能导致董事不敢履职、不想履职、履职时一味避免风险决策。

首先，依据《民法典》第 1168 条董事与公司存在共同故意时成立连带责任，已足够在事前制止董事与公司参与共同欺诈。其次，当董事与公司不存在共同故意，仅在履职上存在重大过失时，则董事与公司承担按份责任，或董事对其造成损害部分承担相应数额的补充责任，均有助于督促董事勤勉尽责履行职务，同时补充责任也有助于充分赔偿债权人，而对于公司无力清偿时也可以通过第三人责任为第三人提供保护，以填补破产法当前不存在濒临破产公司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漏洞。最后，应依据董事的不同过错和参与程度分析董事的责任形态，明确不同类型董事的义务与责任，确定相应归责事由以及赔偿范围，并

有助于出台细致的履职指引实现事前预防。例如第三人责任应区分执行董事、双控人背景的非执行董事、其他外部董事与独立董事、职工董事。采取多样化的责任形态，而非一刀切式的连带责任，符合公司治理中董事类型的多样化现实，有助于精确界定责任，让法律充分回应商业实践，切实推动营商环境与投资者保护进步。

总之，新《公司法》第 191 条的规范功能应为有限地完善董事民事责任体系，而不是无限制地扩张董事责任，要求董事对公司外部第三人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四、董事第三人责任的规范分析

明确了第三人责任的正当性基础与规范功能后仍需对该规范进行细化，以下将说明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法律性质以及构成要件。

（一）法律性质

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法律性质向来为学说争议点，其中主要包含法定责任说以及侵权责任说两种观点。

1. 法定责任说

法定责任说也称特别责任说，其认为第三人责任实质为任务懈怠责任，即董事违反对公司的义务且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需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对第三人承担任务懈怠责任。日本学界以法定责任说为通说，认为《日本公司法》第 429 条为公司法特别责任，所谓故意或重大过失是指对公司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范围包括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其与《日本民法》第 709 条规定的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存在竞合。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 23 条为法定责任，与侵权损害赔偿有所不同。

新《公司法》第 191 条的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法律性质不宜解释为法定责任。其一，合法性义务仅基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违反基于内部关系的义务在理论上难以证成构成对外部第三人的责任，第三人责任的法律基础为董事与第三人直接发生外部关系，并不是董事与公司内部关系的外部化。其二，确定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法律性质需要考虑民商法的体系效应。在日本，当董事损害公司进而损害第三人时，通说认

为第三人责任为公司法的特别责任，其原因为 2005 年的日本公司法废除了法定最低资本金，因此需要通过强化董事责任以保护债权人，而特别责任说较之侵权责任说赋予董事较重的注意义务以及责任，因为在此之前依据《日本民法》第 709 条侵权之债一般条款已可追究董事第三人责任。我国新《公司法》第 191 条试图从无到有地新设董事第三人责任，纠正法人实在说的绝对化立场，在此之前依《民法典》第 1165 条有关侵权责任的一般性规定追究董事第三人责任并无理论基础，可见新《公司法》第 191 条本身即已加重了董事责任，且其规范功能并未单纯强化债权人保护。循谨慎、渐进的立法思路，我国法不必追随日本公司法通说而选择法定责任说。

2. 侵权责任说

侵权责任说认为，董事第三人责任为一般侵权责任的特殊条款，当董事因执行职务直接造成第三人损害时，不必判断董事对公司是否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此类学说中有的认为第三人责任为侵权责任，故意或重大过失是董事对第三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董事的责任范围包含

直接损害；对于间接损害则有观点认为该情形中的请求权实质为代位权。

我国新《公司法》第 191 条的董事第三人责任应属侵权责任。其一，董事承担第三人责任的基础为董事对第三人具有注意义务，而相关行为的违法性在于董事违反了其行为和交往中对于他人的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非公司通过委任关系向董事转移的公司应负担的注意义务，而是董事在其行为中的注意义务，因此不宜采法定责任说从而将违反信义义务作为理解第三人责任法律性质以及规范构成的基础。其二，该第三人责任不发生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因为董事不是公司与第三人的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如果仅在信义法律关系中讨论董事是否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则需要取决于该第三人的身份，如果第三人为股东，一般而言董事只对公司具有忠实勤勉义务而不对股东具有忠实勤勉义务。因此该第三人责任主要发生在侵权法律关系当中。其三，将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法律性质理解为侵权责任有助于通过适用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对该制度进行补充，例如在公司涉

嫌非法集资时，依据董事在非法集资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以及是否对公司存在控制或实际影响，适用《民法典》第 1168 条至第 1172 条确定董事与公司对受害人承担按份责任抑或连带责任；而在第三人存在过错时，适用《民法典》第 1173 条、第 1174 条的比较过失予以减轻或免除董事第三人责任；反之，按照法定责任解释可能引致对于法院在个案中恣意判决的批评。其四，侵权责任说除了能够解释董事损害公司偿债能力从而间接地损害了债权人利益的情形，还能够解释董事控制公司或参与公司不法行为进而通过公司人格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而后者尤为重要。对于此一后者，特别法也可规定董事的侵权责任，但将公司法中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法律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意味着可借助新《公司法》第 191 条理解并适用特别法中的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从而强化我国董事责任的体系效应。因此，董事第三人责任宜界定为侵权责任。

（二）适用范围

1. 第三人

新《公司法》第 191 条并未明确第三人的范围，仅规定董事需对“他人”承担责任。其一，并非所有的债权人均属于此处的第三人，对于因合同法律关系成立的公司的债权人，在公司正常经营未进入破产程序也未濒临破产时不适用第三人责任。虽然第三人责任具有保护债权人的功能，但单纯的公司债务不履行时的债权人不属于此处的第三人，仅当董事在合同成立、履行等过程中存在主动欺诈行为时才发生董事第三人责任，例如董事对第三人存在欺骗、夸大公司财务状况等行为。其二，股东抽逃出资时董事原则上不承担第三人责任，但若董事存在协助行为则应依其实际作用以及造成债权未能清偿的扩大部分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赔偿责任，单纯的不作为行为不宜适用第三人责任。其三，公司员工原则上不属于第三人，但如果董事因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员工工伤则应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如未能购买五险一金导致员工因工伤未能获得医保支付，则董事应与公司就员工自行支付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其四，非法集资案件中，对于善意或不知情董事而言受害人不是

第三人；但如董事与公司存在共同故意进行非法集资，则与公司就其受害人所受损害承担责任。

2. 公司形态

新《公司法》第 191 条位于新《公司法》第八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并没有区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公众公司与非公众公司、正常运营的公司与存在破产风险的公司，这一点具有合理性，因为任何类型公司的董事均具有注意义务，在其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得侵害他人的权益。但不同类型的公司依其场景不同，其董事也有可能具有不同的注意义务，可能也有不同的责任形态，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也有所不同，对此有两点应注意。其一，在公众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的情形中，应优先适用《证券法》第 85 条确定董事对投资者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在具体个案中适用该条的结果过于严苛时再考虑适用新《公司法》第 191 条以确定董事在公众公司证券虚假陈述中的民事责任。在此解释方法下，可将《证券法》第 85 条第二句中的董监高责任进行目的限缩性解释，即解释为董监高仅在与公

司存在虚假陈述的意思联络时承担连带责任，无意思联络时则转而适用或参照适用新《公司法》第 191 条的规定，就虚假陈述的受害投资者视不同情况承担不同形态的赔偿责任；进一步而言，立法者和理论界还应当在未来证券法修订中重思《证券法》第 85 条的合理性。其二，在公司存在破产风险时董事恶意负债的，可以适用新《公司法》第 191 条；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经人民法院批准由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司，则应在企业破产法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相关规定框架下，确定自行管理债务人董事的责任。

3. 董事

本条所称董事应作广义理解。其一，确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时，需依据不同董事的业务执行及信息取得情形确定其过错及其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岗位和职责；对公司经营情况的了解以及是否为了了解或核验公司信息采取了相应措施；公司是否为其履职提供了相应条件；其在信息披露或业务执行中所起的实际作用等等要素。其二，“事实上董事”仍属于本条所称董

事，因为事实董事如果参与或促使不法行为，则仍需对外承担责任。对此需以特定行为人是否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表决，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对其活动的知情程度予以综合判断。其三，对于名义董事，如果不存在选任的决议而仅被登记为董事且未参与公司经营，则该行为人不适用董事第三人责任，但如果该董事已被公司解任仍参与不法行为，则亦应承担相应第三人责任。

（三）构成要件

1.行为

第三人责任中的董事行为包含指挥、控制、教唆、授权、批准以及欺诈等行为，分述如下。

第一，当公司董事存在对公司的指挥、控制以及教唆行为时，应当与公司成立共同侵权从而承担连带责任。例如董事事实上控制公司进行非法集资，此时公司与董事就其损害对第三人承担连带债务。

第二，当公司董事仅参与对侵害第三人的行为的批准、授权时，如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应对第三人承担责任。不过此时董事的行为并不能直接对第三人造成损害，因为公

司行为与董事行为仍然具有差异性，此时应当基于批准该特定行为或决议的数个董事与公司行为之间的区分，分别判断数个董事在侵权行为中的参与程度，并依个别董事的参与程度确定其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如果该董事参与在批准、授权时具有重大过失，但并无故意，则仍然可能依《民法典》第 1172 条承担按份责任。

第三，当公司董事存在欺诈行为时，包括财报造假、公司濒临破产时故意过度负债以及拖延申请破产的情形，应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欺诈侵权中的赔偿范围包含纯粹经济损失，因此故意进行欺诈的董事应对投资者所持股份的价值下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 14 条第 2 款规定了抽逃出资时董事对第三人的赔偿义务，且将“违反勤勉义务”作为构成要件之一，类似采法定责任说。但新《公司法》调整了《公司法解释三》的做法，新《公司法》第 53 条第 2

款规定的是负有责任的董事对公司的赔偿责任。因此外部第三人追究董事在抽逃出资中的第三人责任，应转而适用新《公司法》第 191 条。通说认为股东抽逃出资的责任性质为侵权责任，在该观点下可适用新《公司法》第 191 条确定提供协助的董事的责任。

最后，当董事仅知情但并没有积极参与侵权行为时，不承担侵权责任。董事对第三人仅存在一般注意义务，因此仅当董事依其个人行为对该第三人存在积极作为义务时，才会因其不作为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故意或重大过失

董事第三人责任中行为人的过错为故意或重大过失。由于该责任的法律性质应采侵权责任说，而非法定责任说，因此该过错也应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故意包含直接故意以及间接故意，且要求董事对侵权行为有认识或知情。重大过失指的是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的不正当性但并没有履行一般人的结果回避义务。董事作为个人参与商事活动，为排除第三人责任滥

用对其履职干扰，因此不宜要求董事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排除轻过失下的损害赔偿责任，《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 13 条对于现行《证券法》第 85 条、第 163 条中“过错”的解释，也持类似的观点。

与《日本公司法》第 429 条第 2 项的推定规则不同的是，新《公司法》第 191 条并未规定推定或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因此原告应举证证明董事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同时，董事可以证明自己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已尽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进行免责。需要注意的是，此处董事的注意义务为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不是对公司的信义义务，如公司作出了非法决议但董事不予执行，此时的董事虽有可能不符合信义关系的要求，但却履行了董事对第三人的一般注意义务，不会发生第三人责任。

3.第三人损害

关于第三人损害的界定存在直接损害说、间接损害说与两损害说三种观点。直接损害说认为，第三人责任的损害范围限于董事行为对第三人造成的直接损害；间接损害说认为，董事第三人责任的范围仅限于董事因侵害公司利益给第三人造

成的间接损害，例如董事的经营懈怠导致了公司受损，进而导致了债权人受损；两损害说认为，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均属于损害范围。

我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损害范围同时涵盖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其一，我国新《公司法》第 191 条责任的法律性质为侵权责任，其前提是董事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违反，而不是董事对公司的法定信义义务的违反及其违向债权人的扩张。无论是董事直接侵害第三人违反对第三人注意义务造成直接损害，还是董事损害公司偿债能力造成对债权人间接损害，亦或是董事控制公司及参与公司不法行为从而损失第三人造成间接损害，在董事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均构成对第三人的损害。其二，新《公司法》第 191 条的规范功能为补充董事对第三人的一般性损害赔偿规范，这一点与日本公司法学的通说不同。日本公司法认为第三人得以通过《日本民法》第 709 条对董事主张侵权责任，在此意义上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法定责任说具有加重意义，从而也有必要区分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损害范围直接决定了的董事责

任加重程度。我国新《公司法》第 191 条的意义在于补充法人机关成员的一般损害赔偿，而非在已经存在法人机关成员一般责任的前提下，在特定损害范围内以董事法定责任加重对董事的苛责，因此逻辑上不必循日本法的思路区分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其三，董事因违反注意义务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与是否侵害公司利益并无必然联系，一行为可能违反对公司的注意义务也有可能违反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违反对公司的注意义务就必然违反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因此，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均应纳入董事第三人责任的制度射程。

4. 因果关系

新《公司法》第 191 条中的董事行为与第三人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要求为必然因果关系，因为第三人损害可能为多个行为的结果，包括公司行为以及不同董事的行为。因此只需要证明董事与其结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即可，也即如果不存在该不法行为，则不会发生该损害；如果不存在该不法行为，依然会发生该损害，则应当认为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需

要注意的是，原告如主张董事存在故意欺诈行为，应举证证明原告对该董事的表示或披露存在合理信赖（Reasonable Reliance），以主张存在董事行为与其损害之间的相当因果关系。

五、结论

在判断董事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赔偿责任时应准确评价董事行为，其关键在于董事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及其行为的可归责性。新《公司法》第191条引入第三人责任值得肯定，其规范功能为我国董事责任体系的有限补充，而非无限扩张。是否需承担连带责任应依据董事在不法行为中的参与行为、程度以及与公司行为的联系进行判断，同时依据其他商事特别法的规定确定在特殊情形中的董事第三人责任。第三人责任在法律性质上宜界定为侵权责任，其适用范围包括债权人及投资者，但需注意在一般的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对董事不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构成要件上，需具有侵害行为、故意或重大过失、第三人遭受损害以及损害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除特别法另有规定，故意及重大过失原则上需由原告举证证明，董事得

以证明自己已尽注意义务从而主张不承担责任。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害以及间接损害。组织责任不能掩盖个人责任，反之个人责任也不能代替组织责任，法律应准确评价个人与组织的各自过错，公司法亦应如此。建立我国董事第三人责任的一般规则，有助于督促公司管理层诚信经营，强化公司法责任的体系效应，推动我国公司制度以及营商环境稳步发展。不过在第三人责任的问题上如何确定公司与董事之间的责任形态，以及如何协调民法典与公司法、证券法与其他商事特别法之间关系，仍有待未来持续进行深入讨论。

侯丹华&陈越峰：市场主体登记的合法性审查 | 微课程

——摘自微信《上海一中法院》

宁博：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上海一中院金色天平微课程，今天让我们来谈谈市场主体登记合法性审

查的相关问题。我是来自上海一中院行政庭的法官宁博，由我来担任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上海一中院副院长侯丹华以及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陈越峰。侯院长、陈教授欢迎二位的到来！

侯丹华：

主持人好！大家好！

陈越峰：

主持人好！大家好！

宁博：

侯院长是上海审判业务专家，长期从事行政审判业务工作，对行政审判实践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陈教授对于行政法理论有着深入研究，也长期关注行政管理和行政审判的实践。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审判专家和学者的观点互动，听听他们对于市场主体登记审查的相关意见。

侯院长、陈教授，我们都知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未来五年我国主要发展的目标任务，其中就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那么，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强调市场

主体最大程度地自由参与。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设计市场主体登记这样一项制度？它有什么重要的功能？陈教授，能否先请您给我们简要解释一下？

陈越峰：

好的。市场主体登记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不仅是我们国家，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都有这样的制度。具体而言，它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功能。

一个是设权功能，也就是市场主体登记之后获得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受非法干涉。同时它也会产生公示公信，从而促进交易。就好比最近热播剧《繁花》当中的“宝总”，他要跟着爷叔做外贸生意，那就要先登记注册一家公司，以后才会有三只皮夹子，也就是资产、商誉和估值，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是调控功能，也就是政府通过登记制度来掌握市场主体的设立与运营的状态，从而维护市场运行的秩序和经济安全，包括交易安全，保障交易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总之，从私权和公益的保护这

两个方面来形成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主要功能。

宁博：

谢谢陈教授。您刚才提到市场主体登记主要是有设权功能和调控功能两项主要的功能。那么侯院长，从我们行政审判的角度来看，正确把握好、理解好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功能，对于审查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侯丹华：

刚才陈教授对于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主要功能做了一个简略的描述。我认为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功能定位存在于法律规范所确立的立法目的当中，以及总则和基本原则当中，理解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功能就理解了立法目的。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立法目的，才能在具体适用法律条文的时候，在合法性审查的时候不偏离法律的文意，不偏离立法的初衷。

宁博：

侯院长提到的功能其实是跟立法目的相挂钩的，那么从实务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更好地把握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功能？

侯丹华：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立法理想和制度安排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实践当中。市场主体登记条例等一些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社会关系往往涉及多种主体。

无论从司法审查的视角还是从行政执法的视角，市场主体登记制度不只是规范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其实也通过告知承诺、事后监管等方式督促市场主体，特别是作为其中核心的经营主体，在申请注册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当中，应当如实申请，诚信经营。

同时，这项制度也影响到市场其他参与方的利益，甚至是公共利益。所以在适用法律的时候，还需要从利益平衡、价值衡量等角度进行把握。这也需要对这个制度的功能进行一些深入的了解。

宁博：

谢谢侯院长！刚才二位都谈了自己关于市场主体登记功能的理解，听下来这项制度无论是对于市场运行、行政规制还是司法实务都非常重要，这就为我们接下来进一步探讨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其实市场主体登记制

度包含很多规制的措施，除了登记本身以外，还包括监管、处罚等。但是今天限于时间只能去探讨市场主体登记本身的问题。

刚才侯院长也谈到了实务的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实务。其实，在市场主体登记领域，确实存在一些人比较困惑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就是登记合法性的审查标准。我们究竟用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市场主体登记行为是对还是不对？侯院长，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侯丹华：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9条规定了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但是形式审查并不意味着登记机关完全无为而治，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是“有限而有为”。

从登记机关来说，对于材料所反映的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合法性仍然应当进行必要而审慎的审查。那么，必要而审慎的审查到底如何来界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必要而审慎的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有相关的指导意见。当然，个案法律关系复杂多元，每个案件的争议

点也有所不同，实践中的标准实际上并不是绝对清楚的，有待于在理论和实务的层面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进行探索研究。同时，登记机关对于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也要进行事中事后的监督。

宁博：

侯院长，人民法院在审理市场主体登记类行政案件的时候，对登记行为的合法性究竟应当审查到什么样的程度？

比如说我们在实践中就会遇到，有的时候当事人会以登记材料不真实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登记行为。

前一阵子，我们就碰到一起这样的案件，原告本来是一家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但是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股权被转让到了他人名下，而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变更登记为其他人。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同意过股权转让，也从来没有同意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而是他人冒用自己的签名，冒用公司的签章去办理的违法登记。据此，原告诉到法院，请求撤销上述的登记行为。

像类似这样的案件，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侯院长，您是什么意见？

侯丹华：

对于登记行为，从法院的角度来讲，人民法院仍然应当贯彻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合法性审查的标准，这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如果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存在材料虚假、签名不实等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出现了新的事实，比如事后有生效的民事判决否定了登记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那么从实质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登记机关应当对此进行必要的调查、处理。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行政程序当中，登记机关也要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是依职权主动进行调查。

刚才主持人宁博提到的案件就是这样，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是因为有另一件关联的生效民事判决否定了股权转让和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决议的有效性。所以就导致涉案登记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发生了变化，后来经过人民法院的释明，登记机关也依法撤销了登记，这个案件最后是得到了实质性的化解。

当然也有的案件经过审理，虽然也有一些材料非原告本人签名，但是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对于登记是知晓的，或者是事后追认的，比如有些

证据能够证明到原告事后有参加公司的设立或者是经营等一些事实，那么应该说这样一个登记就不能被认定为是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所以原告撤销登记的主张就不能得到支持。

在登记机关登记的时候已经履职尽责的情况下，因为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所引发的的问题，其实当事人及相关的主体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这个在最高法院的座谈会纪要中也有所明确。

就是说实践当中，对于民事行为的真实性问题是可以根据有效证据在行政诉讼当中予以认定的，对于涉及真实性以外的民事争议可以告知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我前面所讲的主要是法院在审理市场主体登记案件时候的一些具体的、实操层面的做法。要处理好这一类案件，本质上还是要把握好追求市场效率和保护权利之间的平衡。

宁博：

谢谢侯院长！侯院长刚才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其实既包括非常具体的审判实务，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关注价值权衡的重要性。陈教授，您对这个问题的有什么看法？

陈越峰：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形式审查标准是跟市场的效率原则相契合的，也符合行政的效能原则。但是，正如侯院长刚才所言，形式审查并不代表无为而治，更不能不作为。那么实践当中，因为错误登记也引发不少诉讼，应当加以妥善的解决，因此不能形式化地、甚至机械化地理解和适用形式审查标准。

也有观点认为，我们国家行政许可法规定企业设立登记是行政许可，因此应当对作为行政许可的登记的合法性采用实质审查标准。后来为了统一审查标准，最高法院在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座谈会纪要当中提出了审慎审查标准。

刚才侯院长也系统进行了阐释，包括结合案例做了阐明。审慎审查标准偏重于审查登记机关在主观上是否尽到了审查义务。因为是一种对于审查的主观状态的再审查，所以确实需要结合具体案件，通过在类案上的梳理、提炼、归纳，从而最后基于案件类型具体化，实际上也会呈现某种客观化。同时这个审查标准也需要根据我们目前营商环境

优化、经济发展改革等来动态地加以把握。

宁博：

您的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对于审查标准的把握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动态的眼光，毕竟为市场经济服务的体制说到底还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我们刚才提到的当事人认为材料不真实这类案件的审理呢？

陈越峰：

当事人如果以相关材料不真实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相关登记行为，这个时候不仅要看登记机关是不是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还要看登记是否确实存在错误。

最高法院在相关判决当中曾经指出，确有实质错误的行政行为理应得到及时纠正。我们也有有错必纠这样的政策。依法进行形式审查的行政行为，如果所依据的材料确实存在虚假或者是错误，那么其实也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当然也要考虑到撤销登记对已经发生的市场交易和既存的法律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刚才在讨论案例的时候说到，有冒用签名等形成了后续的决议，侯院长也讲到，就是即使当时不知情，但是事后知情了，事后又以相应的投资或者其他的法律行为来追认，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不能一撤了之。所以要考虑到它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包括对债权人公司的职工、股东以及善意取得人的影响。总之，就是要考虑到交易秩序的稳定性。实际上，它背后也隐含着对一个对法的安定性的追求和实现。

此外，我也在想法院也可以向登记机关来释明，登记机关可以根据释明，依职权主动进行纠正，在理论上有时候也会把它称之为行政程序重开。这样就可以在行政的过程当中实质地解决登记争议，而且非常迅捷。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都会比较好。

宁博：

您这个想法和刚才侯院长提到的我们针对上面这起案件的最终处理方式不谋而合，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刚才，我们深入探讨了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审查标准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形式与实质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实践中，其实还有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值得大家重视，就是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这个实施细则的基础之上，国家市监总局、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往往会用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在刚才所说的规定的基础之上，为了增强实务中的可操作性，作一些更为具体的规定，其中有一些内容就是在法规规章之外所作的一种创设性的规定。这种规定的方式可能会在实践过程中增强可操作性，但由此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针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其中相关的创设性的规定，我们在适用的时候该如何把握？陈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陈越峰：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实践当中确实也有这个说法，认为跟法律相比红头文件更重要。

原则上来说，行政诉讼法也有规定，红头文件或者说您刚才表述的法律法规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是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规范依据。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也明确了其他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

渊源，对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是经法院审查认为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这些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说红头文件，是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那么法院应当承认其效力，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考。

合法有效、合理适当我们学理上大体上这样来理解，就是首先它不能跟上位法相抵触，就是合法，从而是有效；合理适当，是符合市场的效率原则，符合效能原则，不会说是额外增加成本等等，这是一种把握。另外，目前市场主体登记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仍然不断在推进，因此也需要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上位法的立法精神以及制度改革的方向，也包括规范性文件所要考虑的多元来作综合的判断。

这样一来，我们学理上就把它称之为一种框架秩序，就是法律规范体系的框架秩序，而规范性文件就会被作为框架规范的组成部分加以综合考量，这时候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有可能会超越不抵触标准。不抵触标准非常刚性，但是在整体上符合立法目的、改革方向这样的一种原则之下，立足于整体法律规范

框架的正当性来作综合考察，可能是更加符合法律精神的。

宁博：

听下来陈教授的意见其实原则上还是上位法优先，但是同时也要考虑改革所带来的一种动态调整的需要。那么侯院长您对这种规范性文件适用的难点有什么意见？

侯丹华：

行政审判涉及行政领域广泛，适用到的法律规范层级和门类也是比较多的，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也经常会碰到怎么解决法律冲突的问题。市场监管领域也不例外，如何协调适用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法律规范，一直是个案或者类案审理中要解决的问题。

就人民法院而言，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适用下位的法律规范，甚至是一些其他低层级规范性文件的前提，就是下位的法律规范不能违背上位法律规范授权的目的和范围，也不得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精神，特别是不得在上位法规定之外对申请人创设新的负担，否则就可能在市场主体登记层面影响市场主体的信心，包括还会直接影响到营商环境

的优化，对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宁博：

听下来侯院长对于上位法优先的原则也是坚持的，那么实践中，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下位规范的某项规定可能构成对上位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一种解禁，从而引发相应的争议。

比如说，实践中我们就碰到过一起案件，某公司因为违反了法律规定被吊销了营业执照，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负有个人责任，但是在公司法规定的禁止期限之内，这位法定代表人又被登记为了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不服，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登记行为。

审查中我们就发现，登记机关其实就是依据一份其他规范性文件，它里面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就是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能够注销这家公司，就可以从市场监管系统中任职的限制名单中被移除，从而具备担任其他公司法

定代表人的资格，那么争议也就是由此引发的。

侯院长，像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

侯丹华：

宁博，你刚刚说的案子我是知道的，从法治统一的要求来说，对于上位法的一些禁止性的规定，除非是有明确的授权，否则下位法不得作出不一致的规定。

刚刚这个案例实际上后来经过审理，我们认为作为登记机关的被告，它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公司法当中限制这一类人员任职的规定精神是不相符合的。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中没有参照这个规定，最后给出的判决结果是撤销了登记行为。

当然了，强调统一并不是机械地去排斥相关部门和各个地方依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改革创新改革的路径，毕竟要打造高效便捷、规范统一的市场。

所以近年来，上海也是充分利用立法的授权，在浦东新区开展了市场主体登记制度改革，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措施，这

些对于我们对标营商环境的国际标准，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成果，复制推广改革经验都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就人民法院来说，也应充分践行能动司法，依法保障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陈越峰：

我插句话，刚才您和侯院长讨论的案例给我一个启发，我们讲下位法，比如规范性文件不能给相对人创设负担，即不能增设义务。那么减少义务是不是可以？甚至增加权利是不是可以？

但是我们也知道，上位法有一些禁止性规定，比如说任职的禁止等，那么现在各地因为营商环境优化的需要，所以有的时候像刚才您案例当中讲的这种情形，它解禁了，它给了一个解禁的途径和渠道。这里我们通常会觉得没有增加它负担，甚至是更有利。那这时候就需要考虑到，上位法立法的时候有多元的利益考量，需要考虑到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安全，需要考虑到交易相对方的权益。所以我理解这个不抵触，它从来不应该是单向的，而应该是非常综合多元地考量，也就是说我

们在很多情况下要考虑到那些看似不在场的各方主体权益，因此需要综合地考量。所以我觉得法院所作的裁判是非常妥当的，对市场主体跟公众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律上的引导。

宁博：

陈教授的意思其实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还是要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达到一个平衡。侯院长刚才提到的观点，也表明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和把握是要注意上位法优先，同时也要注意融合我们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和多元利益的平衡需要。

侯丹华：

刚刚陈教授讲到了多方利益的平衡，讲到进行多方的考量，我也是非常赞同的。从市场登记行为来讲，它针对的不仅仅是管理相对人，另外还有受到市场登记影响的其他相关人。那么回到立法目的来说，市场登记管理条例的立法目的，它有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也有维护市场秩序的规范。

所以说，从维护市场秩序的规范来说，像上位法的一些考量、一些制度的要求，在下位法具体的实施

过程当中应该也是要遵循上位法立法目的，不能偏离立法目的。从市场登记来说除了建立一个高效便捷、规范统一的市场登记管理体系，另外也要有风险防范和诚实经营这样的要求。所以说其实无论是从实务的层面还是从理论的层面，这一点应该是一致的。

宁博：

谢谢侯院长！也谢谢陈教授！市场主体登记制度虽然只是一个点，但是从这个点中能够真切地折射出我们的制度建设和治理水平，也能够折射出我们的营商环境和治理理念。今天，侯院长和陈教授他们的讨论既有功能、价值这样的宏观视角，

又有对具体问题的剖析解答，更有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清晰展望，让我真的感到受益匪浅。

由于时间原因，关于市场主体登记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只能以后有机会来继续深入地探讨。这里再次感谢二位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今天，我们上海一中院金色天平微课程到此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再见！

侯丹华：

谢谢，再见！

陈越峰：

谢谢，再见！

如您对本资料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联系：徐倩倩 qianqian.xu@mhplawyer.com